

从《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 看“四人帮”利用电影为篡党夺权 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市电影局党委常委 江雨声

长期以来，“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文艺革命的旗手”，从政治上、组织上、创作上，对文艺界进行严密控制，特别是紧紧抓住电影这个影响最大、最广泛的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紧跟“四人帮”，干了大量的坏事，尤其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后，他们紧密配合“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进行了一系列罪恶活动。

现在，根据电影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我代表电影局参加这次会议的几个同志，仅就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和《盛大的节日》两部影片来看“四人帮”是怎样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

《小凉河》原来是江苏省一个作者写的小说，徐景贤要上影厂改编，并多次给修改剧本定调子，发指示。去年年底通知：“剧本可以不再改了。”局、厂党委就决定成立摄制组，准备拍摄。可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今年二月初，马、徐、王为了配合“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的阴谋，认为《小凉河》剧本可以利用，由徐景贤亲自出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推翻了局、厂党委原来的决定，背着江苏省的原作者，指使秘书亲自动手，又对剧本作了五次修改，要摄制组照改定的本子一字不动地进行拍摄，并决定用美国“依斯曼”彩色胶片，拍宽、窄两条。徐景贤满意地说：“这样改一下很好，应当把《小凉河》作为重点。”剧本经过市委印刷厂铅印后，编了号，送到摄制组，再三关照：“剧本内容不得外传，谁传出去，谁负责。”当时，演员组要求读一读新剧本，他们不同意。戏是要演员演的，可是剧本却不准演员看，为什

么？就因为有从南京请来的演员。他们还专门查问过：“这个演员怎么样，靠得住吗？你们要做做工作。”更有甚者，原作者要看剧本修改稿，也迟迟不给，连摄影棚也不让他进。对剧本如此保密，也是电影史上没有见过的咄咄怪事！他们这样严密封锁，偷偷摸摸，怕见群众，怕传到南京去，只能说明心中有鬼！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联系到批邓时，“四人帮”说：“南京乱得不够”，要派人去捣乱。马、徐、王就是抓住江苏的这个剧本，背着原作者进行篡改，回过头来再打江苏。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原剧本的时代背景从一九七二年改成一九七五年前后，又恶毒地在剧中大大加强了走资派夏副主任这个人物，企图借《小凉河》来达到大乱南京，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负责同志的罪恶目的。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徐景贤派人来传达意见，让剧本不要再用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口号和提法，胡说：“他们的那些提法，我们不要去用。”什么“他们”、“我们”，徐景贤等人的反革命政治立场是何等鲜明！“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是华国锋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主持召开的，马、徐、王反对农业学大寨会议，就是妄图达到破坏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砍倒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

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规划，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华国锋同志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也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斗口号。徐景贤等却别有用心地让剧中走资派夏副主任来说：“现在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形势，把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的生活搞搞好，这是上头的精神。”而又让一号人物周昌林，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成修正主义口号来批判，其险恶用心何其毒也！

徐景贤要在《小凉河》中突出刻划县革委会“夏副主任”这个人物，决不是孤立的。今年三月份，于会泳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提出文艺作品重点要写所谓英雄人物和走资派的斗争，还说这是“时代的需要”，“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是一个大阴谋，戳穿了，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

“四人帮”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张春桥露骨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江青叫嚣“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到走资派”，是“一般客观规律”，叫嚷从“组织上动大手术”。马、

徐、王也鹦鹉学舌，大谈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他们按“四人帮”定的调子，把剧中走资派夏副主任写成是“出身好，有功劳，不贪污，不腐化”的老革命，让周昌林批判夏副主任说：“你过去推翻三座大山，你是淌过血，流过汗，可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你搞懂了没有？……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停步不前，甚至利用你手中的权力，为地主资产阶级干事……”。他们就是这样妄图把参加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干部，都定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当成今天的走资派统统打倒！他们在修改稿上还精心策划了夏副主任和白汉成的一场戏，夏说：“你下次来，就到第一书记办公室来找我！”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在剧本中，还给夏副主任写了这样一段杀气腾腾的台词：“……究竟是你第二次打倒我，还是我第二次打倒你，咱们走着瞧，不过我有一句话要奉告你们这些造反派，想一想，现在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是邓小平！”在六月二十六日，马、徐、王审查影片时，徐景贤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这样提法太实了，太露了，还是改成：‘主持中央工作的是什么人’，让观众去意会。”徐景贤要观众意会什么？他口口声声讲《小凉河》是紧密配合批邓的，却又把邓小平的名字虚掉，很明显，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审查影片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大家知道，这时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华国锋同志。徐景贤的矛头指向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在拍摄过程中，徐景贤、于会泳等人一再要求摄制组把摄制《小凉河》，“当成一场硬仗、政治仗来打，越快越好，三个半月拿出来，就是立功。”逼着摄制组白天黑夜地干。七月一日，在影片缺少六十多个镜头的情况下，匆忙通过在全国上映。如此迫不及待，因为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时机已到，借批邓机会，全线出击，猖狂进攻，大叫“舆论造得越快越好！”以便在“四人帮”的政治宴会上邀功请赏。可是《小凉河》上映后，受到工农兵观众的许多严厉批评，徐景贤等人十分恼火，给报社下指示，组织了评论文章，吹捧《小凉河》，对工农兵的批评意见进行反扑，利用报纸打棍子，戴帽子，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马、徐、王却正是利用《小凉河》这部影片，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罪行累累，铁证如山！

“四人帮”一方面利用电影，妄图为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篡党夺权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利用电影，迫不及待地突出宣扬他们自己。《盛大的节日》就是“四人帮”及马、徐、王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为他们上台鸣锣开道，这是他们怎么也抵赖不掉的罪证！今年五月八日，野心家、阴谋家王洪文在钓鱼台接见上海去北京开“内部资料片”会议的徐景贤的秘书等人时，就别有用心地说过：“要写文化大革命，十年了，应该写好，……过去说过，写地富反坏接触党的书记少，其实，坏事都在党内负责干部。”

今年五月十六日，马、徐、王借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为名，让市委、市革委会全体委员观看话剧《盛大的节日》。看后，马、徐、王大加赞美，马上肯定这是个好剧本。徐景贤还把他的秘书抽出来，执笔改编《盛大的节日》电影剧本，指使他选演员，看外景，看遍了上海所有高级住宅，特许调动市委机关各种高级轿车，又由马、徐、王三人亲自批准，调动五千民兵参加拍摄工作，还要陈阿大当顾问。徐景贤还亲自处理外借演员事情，派秘书三次到北京去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商讨剧本，真是兴师动众，规模空前，比当年“四条汉子”策划拍《燎原》，更加不惜工本。这在我们上影厂是史无前例的。

于会泳在“四人帮”授意下，同样是倍加重视。过去他们规定不审查剧本，对《盛大的节日》却是完全“破格”。他们看到徐景贤秘书送去的本子之后，以空前的速度，用文化部核心小组名义发来十八条意见，第一条就是：《盛大的节日》是写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一个剧本”，定为“重点”的“重点”。对选演员大开绿灯，刘庆棠等人亲自出马要其它电影厂、剧团停拍、停演，把演员让给《盛大的节日》。于会泳还打电话给徐景贤，说：“要多支持《盛大的节日》”。徐景贤说：“当然要支持，是我们的重点片，连我的秘书也抽去了。”后来，徐景贤还说过：“我要看样片。要细细的抠。”“四人帮”对《盛大的节日》的本子，也是一直抓得很紧的。今年八月，张春桥、姚文元还派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来上海抓《盛大的节日》的情况。肖木说，剧本已经通过，同意拍摄。

当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不久，摄制组的同志还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徐景贤等人就逼着摄制组加紧赶拍，下令一定要在十二月交出来。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异常猖獗，他们在北京阴谋策划召开“三中全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马、徐、王在上海迫不及待地要拍出《盛

大的节日》，是有计划、有目的地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张春桥、王洪文树碑立传，来迎接“四人帮”反革命政变成功的所谓“盛大节日”。“四人帮”和马、徐、王这一罪责是逃脱不了的。

可是，徐景贤对《盛大的节日》政治上的要害，始终回避。“四人帮”揪出后，上影厂的群众责问他们时，还矢口抵赖，胡说什么《盛大的节日》是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不是为张、王涂脂抹粉的。事实怎么样呢？《盛大的节日》是借安亭事件为背景的，其中突出的人物就是张春桥和王洪文这两个人的化身。在《盛大的节日》剧本中，有一个干部叫井峰，原是三、四号人物，后来被改成为二号人物，他们还想把他改成一号人物。朱永嘉等人曾多次说：“要把井峰写成一号人物。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没有分裂，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春桥做了工作。”又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春桥、文元搞起来的，没有张姚就搞不起来。”“井峰要在关键时刻出场。”现在剧本中井峰两次出场，就是根据这个反革命调子定的：一次是铁根造局党委的反，受压后，井峰来支持；一次是剧中的重场戏，造反派抓了保守组织头头，工人队伍中要分裂时，井峰出来做了工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井峰就是“假革命的反革命”张春桥的化身，就是为这个早在三十年代就跪倒在敌人脚下的“狄克”歌功颂德的。铁根这个人物，剧本中原来有一句话：“他是第一个起来造反的”，后来又改成“他是影响最大的”。几个字之改，便露出了马脚，因为当时的实际是：王洪文不是上海第一个造反的，而是他们吹捧起来的所谓影响最大的造反派头头。不打自招，铁根不就是王洪文吗！

“四人帮”这伙反革命，平日煞有介事地口口声声说，文艺作品不要写真人真事。可是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竟在《盛大的节日》中把传说的王洪文在公共汽车上开会看书的情节，硬搬进了剧本里。摄制组认为这样写不好，也不便于拍摄。他们再三强调：“这场戏不准修改，而且一定要拍出意境来！”请看，这帮家伙，为了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什么荒唐丑事也干得出来的。

《盛大的节日》不仅为张春桥、王洪文树碑，而且也为徐景贤立传。在剧本中，走资派高尤的秘书有句台词：“市委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拍摄时，他们还嫌不够明显，又加了一句台词：“高尤召开黑会的记录，也被机关革命造反派查获了。”这里所指的市委机关造反派是谁，一看就清楚，就是那个在张春桥、姚文元指点下，摇身一变，所谓在“市委后院起火”的徐景贤！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在拍摄中，他们嫌

“机关革命造反队”的袖章拍得不够显目，还特地补拍一个袖章的特写镜头。还说：“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大家看，徐景贤的野心有多大！？这里还必须指出的，徐景贤为什么一直躲在幕后，声称自己没有参与剧本的炮制，把他的秘书推到幕前，上窜下跳，其罪恶用心，就是借秘书之口，说出他想说而又不便于说的话；就是借《盛大的节日》，既给王、张树碑，又为自己立传，而又不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恩格斯说得好：“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不管徐景贤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外衣，最后总是要被戳穿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毛主席逝世以后，电影《盛大的节日》剧本的炮制者还非常嚣张地叫嚷：“我还要写一个下集，要让工人造反派铁根，当上了中央委员。”甚至狂妄地声称：要把《盛大的节日》“成为‘按既定方针办’的教材，贡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又说：“拍好《盛大的节日》也是属于按既定方针办的范畴，要突出后继有人。”他们就是要王洪文、张春桥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上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马、徐、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和姚文元策划的《光明日报》十月四日的反党文章遥相呼应，肆无忌惮地为“四人帮”阴谋政变，摇旗呐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这一个案，你们能赖得掉吗？我们警告马、徐、王，低头认罪是可以的，狡赖是不行的，纸是包不住火的，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